

被操纵的主体性：丁敦龄的形象建构 与十九世纪巴黎的“中国风”^{*}

王洪羽嘉

内容提要 “戈蒂耶的中国人”丁敦龄如今被看作文学史上的“小人物”，但在十九世纪巴黎他曾被称为“无人不晓的中国人”。丁敦龄在法国的形象经历了复杂的变迁，早期他作为汉学家助手时默默无闻，为俞第德工作后被塑造为正面的中国文人，从而得以参与更多的文化活动，但其能力却在伴随名声而来的争议和媒体狂欢下被掩盖，最终因种种文化活动的尝试接连失败而销声匿迹。丁敦龄的形象嬗变折射出十九世纪中国小人物在法国社会中被凝视的地位、其虚假的主体性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不对等性。

关键词 丁敦龄 巴黎华人 文化形象 汉语传播 文化活动

十九世纪生活在巴黎的华人屈指可数。作为其中最受媒体瞩目的一位，丁敦龄的经历与形象变迁直观反映出当时巴黎社会对华人群体的认识与文化需求。他曾以儒莲等著名汉学家的助手、文学家泰奥菲尔·戈蒂耶家的汉语老师、东方语言学院辅导教师以及中国作家等身份深度参与中法文学文化交流，其间他与戈蒂耶一家尤其是戈蒂耶之女、翻译家和文学家俞第德的友谊，更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俞第德在翻译《玉书》之际同丁敦龄形影不离，并将付梓的《玉书》题献给他；因此，丁敦龄研究作为俞第德或《玉书》研究的补充与延伸，得到了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文学基本文献整理、多元谱系与观念重塑”（24&ZD243）的阶段性成果。

学界的笔墨。^①目前的相关评述和研究大多强调他在中法文学间的中介角色，但丁敦龄对《玉书》翻译过程的实际参与缺少充分证据，多有可疑之处，因此关于他的评价也存在另一种声音，即认为他人品学识俱劣，蒙蔽了俞第德^②，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张力。

一旦将焦点从俞第德和《玉书》转向丁敦龄本人，将关注面从丁敦龄在戈蒂耶家的经历扩大至他在巴黎的全部文化活动，那么其文化意义或许可以得到重新评价。丁敦龄被俞第德推到台前之后逐步在巴黎文坛立足，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和汉学活动，其创作和私生活都被媒体频繁报道。这些多被学界忽视的经历，既可以解释时人对其品行和学养的评价为何褒贬不一，又引出了更多可追问的问题：丁敦龄为何被戈蒂耶父女介绍给文学界和公众？他的形象变化如何作为中国人在法形象变迁的一部分，映衬出法国社会不同主体的姿态？以俞第德对丁敦龄的描述为起点，重新梳理其生平事迹，不仅可以得到更加立体的人物画像，也能透过其活动管窥彼时巴黎的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活动中某些被忽视的事实，进而在法国文学家、专业汉学家和巴黎华人这三方主体之间把握当时法国的中国形象建构。

一、丁敦龄的人生轨迹与形象变化

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汉语和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从此西方汉学进入专业汉学时代。但是，汉语和专业汉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法国小众而边缘的知识类型。多数法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未曾脱离传教士汉学阶段的论战以及十八世纪天马行空的“中国风”遐想，这种遐想又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对公众态度的塑造而日渐变形。由十八世纪的贬华派流传下来的“停滞中国”与“衰落中国”形象随时事报道而更加凸显，而崇华派眼中的“文明古国”形象虽仍然存在，

^① 丁敦龄之名多出现在《玉书》研究或汉诗传播研究中，在此不再赘言；专门的丁敦龄研究数量稀少，国际资料以法国国家图书馆历史委员会（Carnet de la BNF）的整理最为完整，史料最为权威（see Olivier Jacquot, “Paul Jean Baptiste Marie Tin-Tun-Ling [Ding Dunling 丁敦龄], lecteur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in *Carnet de la recherche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3 oct. 2023, <https://bnf.hypotheses.org/32382> [2026-02-17]）。国内学界代表性的成果有：周笃文《寻找丁敦龄》，载《学问》2001年第3期，第48-49页；刘志侠《丁敦龄的法国岁月》，载《书城》2013年第9期，第39-49页；刘志侠《丁敦龄·俞第德·雨果》，载《书城》2025年第10期，第43-51页；谢静珍《丁敦龄：一个“小人物”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载《澳门理工学报》2022年第4期，第76-85页。本文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讨论丁敦龄在巴黎的身份和形象的转变轨迹，更加立体地勾勒他被法国社会接受的过程，从而思考其中折射出来的十九世纪中法文化关系。

^② 这些负面评价以张德彝、钱锺书的评论为代表，详见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1-162页；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27页。

却停留在与陈词滥调、刻板想象并存的阶段。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比起专业汉学家，文学家更具有扭转公众认知的力量，风靡一时的帕纳斯派^①书写了大量中国风作品，描绘诗情画意、古老浪漫的中国。其中俞第德堪称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她正投身于《玉书》的翻译，并因此常常领着一个长辫子中国人向皇家图书馆走去，为巴黎带来一道特殊的文化风景。^② 这名中国人就是丁敦龄。

丁敦龄于1831年^③出生于山西^④，1850年前后在澳门受洗入天主教。1861年2月，他成为传教士加略利^⑤的翻译助手，后随其远赴法国。加略利曾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和拉萼尼使团翻译，在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他也是一名汉学家，首次将《礼记》译成法语，并著有法国首部汉字声符研究著述《字声纲目》。加略利聘请丁敦龄随他赴法，是希望能在母语者协助下完成自己计划多年的中法词典《汉文总书》。加略利此前的助手多由法国人担任，他能重用丁敦龄，一来是因词典编撰之难，二来应该也是对丁颇为赏识。根据加略利《太平天国初期纪事》记载，当时曾有一位中国秀才为法国方面提供太平天国的情报^⑥；结合同时代外交官张德彝笔下丁敦龄自称秀才的记述^⑦，这位“中国秀才”很有可能就是丁敦龄——一位和太平天国关系成谜的年轻人。

1862年6月8日，加略利逝世，到达巴黎不足两年的丁敦龄陷入穷困潦倒之境。一天，后来成为东方语言学院教授的查尔斯·西蒙·克莱蒙-加诺

① 帕纳斯派不是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但通过《当代帕纳斯》等出版物和戈蒂耶等组织的文学沙龙，汇聚起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坛的核心力量，该流派的主要特征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艺术之美反抗艺术中的情感泛滥或对伦理功能的过度强调，因而可以看作反拨浪漫主义、通向象征主义的诗学现代性阶段。

② 俞第德在回忆录中曾记述自己每日和丁敦龄前往黎塞留街皇家图书馆（see Judith Gautier, *Le Second rang du 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 Paris: Félix Juven, 1903, p. 20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简称“Second”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法国报刊的相关报道也曾叙述法国公众对这一画面的印象：“所有人都见过身着黑袍、头戴栗色小帽、晃着长辫的丁敦龄。即便偶有不认识他的人，只消在下午四点前往皇家图书馆门前的鲁瓦广场，必定能见到他……”（Gaston Vassy, “Informations. La colonie chinoise de Paris”, in *Le Figaro*, 3 févr. 1875, p. 2）

③ 根据谢静珍的重新考证，丁敦龄可能生于1831年5月15日（详见谢静珍《丁敦龄：一个“小人物”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第84页）。

④ 关于丁的祖籍，山西平阳说最为常见，亦见有山西太原说（see Angel Pino, “Trois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Ly Hong-fang, Ly Chao-péc et Ting Tun-Ling, 1869–1870”, in Marie-Claire Bergère and Angel Pino, eds.,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aris: L'Asiathèque, 1995, p. 271）和北京说（see “Un Pékin de Paris”, in *Le Progrès libéral*, 321 [1886], p. 2）。太原说有照片落款佐证，北京说则显然与丁的自述相矛盾。

⑤ 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 1810—1862）原籍意大利，汉语名字为范尚人。关于其生平及其与丁敦龄的关系，参见 Olivier Jacquot, “Paul Jean Baptiste Marie Tin-Tun-Ling (Ding Dunling 丁敦龄), lecteur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Olivier Jacquot, “L'affaire du Chinois Paul Jean Baptiste Marie Tin-Tun-Ling (Ding Dunling 丁敦龄)”, in *Carnet de la recherche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7 oct. 2023, <https://bnf.hypotheses.org/34909> [2026-02-17]

⑥ 转引自谢静珍《丁敦龄：一个“小人物”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第77页。

⑦ 详见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第162页。

(Charles Simon Clermont-Ganneau, 1846—1923) 在街头偶遇丁敦龄, 交谈后得知其遭遇, 于是将此事告知戈蒂耶。据俞第德回忆:

由于之前他几乎与世隔绝地待在那位主教 [即加略利] 家里, 他对法国的语言几乎一窍不通, 也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好不容易攒下的钱很快就花光了。诺诺 [即克莱蒙-加诺] 遇到他时, 他正要去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家——儒莲给他些零活干, 却迟迟不肯支付那微薄的报酬。

克莱蒙-加诺对这个中国人产生了兴趣。他说服此人再次穿上中国服装, 留起辫子: 这个男子重新变得像个精致的瓷人。在穷困潦倒之际, 他遇到过一位出身卑微的女子, 她对他心生怜悯, 继而萌生爱意, 甚至谈婚论嫁; 但就在最近, 她却撒手人寰。而这个可怜的外乡人, 原本还靠她接济度日, 如今又重新坠入赤贫的深渊。(*Second*: 160)

戈蒂耶对克莱蒙-加诺口中的这位中国人产生了兴趣, 要求他带来一起用餐。次日, 穿着考究的丁敦龄来到戈蒂耶家, 多年后俞第德都记得他当时的样子:

那位中国人向我们致以最恭敬的问候——他双手抱拳举到齐眉处, 这举动在我们眼中格外吸引人。他身着蓝色软料长袍, 外罩黑底织花绸缎马褂, 缀着小小的铜扣。依照礼俗, 他头上戴着黑色缎面小圆帽, 帽饰是一枚方形螺钿扣子, 周围镶着金色花丝。他黄色的面孔透着机灵与清秀, 然而激动之情让那面容上的皱纹时舒时紧, 使得那双灵动的细长眼睛不住地眨动。(*Second*: 161-162)

戈蒂耶父女立即被这位中国人所吸引, 主动施以援手。他们原计划帮助丁敦龄返回中国, 但遭到断然拒绝:

“我不回去, 中国!” 他喊道, “要是回去, 会砍我的头……”

见鬼? 他在那边到底犯了什么事? 是个危险的逃犯吗? 良心上背负着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吗?

能听懂他的蹩脚法语, 甚至还能说些中文的克莱蒙-加诺已经盘问了他, 并把自己的推测告诉我们:

丁敦龄极有可能是个参与过谋反的太平军旧部。他打过仗, 一只胳膊

上留着可怕的伤疤——诺诺亲眼见过——一根竹制土炮因绳索扎得过紧而炸裂，撕掉了他一大块肉。遭到追捕，又逢可怕的饥荒而陷入极度赤贫的他，最终被传教士救下，条件是必须皈依基督教。（*Second*: 162-163）

于是戈蒂耶决定将丁敦龄保护起来，聘请他在家中教授汉语。俞第德的这段回忆也是丁敦龄曾加入“太平军”一说的由来。不过《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兵册、馆衙名册、家册、门牌名册中均未见其名。^① 丁敦龄赴法前的经历缺少史料佐证，加之他本人对传奇人生过度渲染，至今存在太多疑点。丁家可能曾经营医药生意，在父亲去世后丁敦龄失去经济支持，放弃学业^②，或许在此后加入过太平军。如果他确实参加过农民起义，应是在皈依基督教之前。然而从时间线索看，太平天国正式起义于1851年，这差不多也是丁敦龄随传教士前往澳门定居的时间，而太平军北伐行至山西要迟至1853年，所以即便他确曾加入太平军，也并非在家乡平阳。1851年之前太平军主要活动于广西和广东，丁是否曾在某地和太平军有过交集，如今无从考证。他也可能是在家乡参加过太平军以外的其他起义，因为当时山西十年九旱，农民起义频发。但山西没有大规模传教士活动，如果他曾参加起义，那么可能是在逃往外地的途中遇到了传教士。

在戈蒂耶家中的文学聚会上，丁敦龄奇特的语言、怪异的着装以及脑后的长辮吸引了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作家好奇的目光。不久，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文学家的日记和报刊媒体的报道中。1867年俞第德的《玉书》出版后，丁敦龄更以“文人”“中国诗人”的身份活跃在巴黎文化界。1868年《费加罗报》的一篇文章提到他时说：“丁敦龄，那位泰奥菲尔·戈蒂耶的中国人，在巴黎无人不晓。”^③ 但到了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丁敦龄已和戈蒂耶家“解绑”，不再像法国人认为的那样“隶属”于戈蒂耶父女，其中既有俞第德与父亲戈蒂耶决裂、戈蒂耶迈入生命最后阶段等因素影响^④，也与丁敦龄的人生规划有关：他已经开始独

① 详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343-426页。此外，在王庆成据国外文献对文书汇编中名册部分的校订和修正中，也未见丁敦龄其名（详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25-346页）。

② 《哨音报》关于丁敦龄重婚案的报道中提到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兼药剂师，他在最好的学校长大”（see Ung Geai, “Tin-Tun-Ling”, in *Le Sifflet*, 178 [1875], p. 2）。

③ Georges Maillard, “Hier-Aujourd’hui-Demain”, in *Le Figaro*, 7 mars 1868, p. 1.

④ 多数文献都提到戈蒂耶去世导致丁敦龄不再担任家庭教师，乔安娜·理查德还指出，俞第德和孟戴斯的爱情与婚姻遭到戈蒂耶反对，而丁敦龄则在此过程中为俞第德扮演爱情信使的角色；戈蒂耶去世后，丁敦龄还是俞第德的朋友，但终因同她发生争吵而被解雇（see Joanna Richardson, *Judith Gautier: A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Quartet Books, 1986, p. 24, p. 32）。

立凭借汉语母语者的身份在法国公共文化领域和专业汉学家竞争，尝试为自己夺得一席之地。可惜的是，他最终未能在专业汉学界成功立足，反因其“重婚案”被多家媒体报道，变成了公众眼中的奇特景观。

1873年，丁敦龄的法国妻子卡洛琳·列揭瓦将他告上法庭，指控他曾在中国娶妻。后来丁被证实确曾在澳门入赘一户人家，但由于1875年开庭时列揭瓦本人已远在美国，没有出庭，丁被无罪释放。关于这一事件，巴黎媒体秉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家名为《家庭周刊》的刊物报道称：

整个巴黎聚集在司法官看这位名叫丁敦龄的勇敢中国人在巡回法院受审，他被指控犯有重婚罪：丁在审判结束后被无罪释放，洗清罪名，比以前更“白”。整个巴黎都作为惩教警察参加了对唯心论者的审判，本刊可以保证，这是一场轰动的审判！^①

报道似乎以完全友好的态度支持这位比以前更“白”的“勇敢中国人”，但句句主语都是“整个巴黎”。这表明尽管媒体和公众认可这位“中国诗人”的文化形象，但其中猎奇心理远大于对丁敦龄个人命运的关切，后者始终是由“整个巴黎”凝视、评判、掌控的脆弱客体，必须满足公众对“白”的期待。

另一份报纸《哨音报》则对丁敦龄语带讥诮：“谁没见过他身着深蓝长衫，头戴瓜皮小帽，盘着棕色的长辫，辫梢打到小腿上，走街串巷？丁有一个梦想：娶一个法国女人为妻。”这篇报道嘲讽丁敦龄痴迷于法国白人女性，因此遭到算计：“[列揭瓦]不再年轻，或者说不再纯真……也许在与异国人的结合中，她找到了一个机会，以一种新颖的方式结束自己并不富于冒险精神的职业生涯。”^②在文章作者看来，列揭瓦其实一早便知丁敦龄另有发妻，并因此将他的命运紧紧捏在手中。“好在丁敦龄被无罪释放了，大家终于满意了。”^③

两份报刊的语调差别与报刊本身的特质相关。《家庭周刊》由阿尔弗雷德·内特门特创办，这位政治家曾主办多种保皇党机关报，但在政治失意后投

^① Argus, “Chronique”, in *La Semaine des familles*, 14 (1875), p. 223.

^② 列揭瓦的职业是英语家庭教师，但相关文献中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其人的细节描述。当时报刊对她的负面描述可能与她的风评以及案件走向有关，比如她在案件调查期间就已经去往美国，了无音讯，又如俞第德等在现场辩护时强调是她主动追求丁并博取其同情心（see Andrew Lang, “A Chinaman’s Marriage”, in Andrew Lang, *Lost Leader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and Co., 1889, p. 36）。

^③ See Un Geai, “Tin-Tun-Ling”, p. 2.

入文学和历史研究工作，并创办了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家庭周刊》，该刊物周末发行，受众是普通的城市工人和商人，内容涵盖大众感兴趣的各种日常话题。《哨音报》则由反保皇派和反波拿巴主义者创办，具有浓厚的政治讽刺色彩。两份报刊中，《家庭周刊》贴近民众和日常的定位有可能使之选择更投合大众心理的报道角度，因而它的态度能比较直观地反映当时丁敦龄在巴黎民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哨音报》的报道则流露出对这个中国小人物乃至对整个中国人群体的轻视，但文章在调侃的同时依旧承认多数巴黎人站在丁敦龄一边的事实，这再次证明了丁在公共领域的声誉。这种声誉来自丁敦龄参与过的文化活动和结识的文化名人。俞第德根据《大清律例》在重婚案中为丁敦龄进行了有效的辩护，居斯塔夫·拉法格等其他法国文学家也曾出庭为丁敦龄发声。^①

《哨音报》的报道提及了丁敦龄良好的教育背景：“他告诉列揭瓦自己出生在满洲里，父亲是一名医生兼药剂师，他在最好的学校长大。18岁时，他获得了Bétré-Mien-Philiméo的称号，意思是‘你的脚跟开始开花了’，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②虽然语带讥嘲，但报道者并不质疑丁敦龄是个读书人。至于所谓丁自称来自“满洲”，如果不是误传（法国人在很长时间里将鞑靼人和汉人、满语与汉语混为一谈），则有可能包含丁敦龄本人的特殊动机：“满洲”并非纯粹的地理概念，还包含族群身份，指向建立清朝的统治民族，如果丁敦龄曾用所谓的满洲出身介绍自己，很可能是为了凸显他的精英地位和文化身份。

法国社会对重婚案的态度，证明丁敦龄在文化界的活跃的确起到了造势和自保的作用。即便身受牢狱之灾，他也不曾放弃文化身份和相关活动。在狱中他完成了一部名为《偷小鞋》的小说，并迅速将这部作品交付出版，获得了市场的热烈反馈。但此后丁敦龄很快回归沉寂，并于1886年病逝。关于其晚年的记载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文学界和汉学界的努力均未取得成功。纵观丁敦龄的一生，其个人命运的起伏折射出中国形象在十九世纪法国的变迁。由于他的人生高光时刻及其公众形象的转折都发生在被戈蒂耶一家收留以后，这段经历值得进一步追索。

^① See Fernand de Rodays, "Gazette des Tribunaux. Cour d'assises: l'affaire du Chinois Tin-Tun-Ling", in *Le Figaro*, 12 juin 1875, p. 2.

^② Un Geai, "Tin-Tun-Ling", p. 2.

二、亦师亦诗人：摇身一变的中国文人

丁敦龄在任命第德家庭教师期间是否曾参与甚至主导《玉书》“不忠”的翻译，一直是引发学界争议的谜团。但若以其形象变化为中心，重审《玉书》争议及相关轶事，则无论这部被称为“不忠的美人”^①的诗集，还是丁敦龄作为“中国诗人”的形象，似乎都指向俞第德对中国唯美形象的有意塑造，属于这位崇华派文学家的中国书写的一环。

俞第德在1863年开始随丁敦龄学习汉语，1864年首次发表她改译的中国古诗，1867年正式出版中国诗歌译作集《玉书》。虽然在《玉书》之前，专业汉学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已经出版过首部法译中国诗歌集《唐诗》，但其传播一直没有《玉书》成功。《玉书》的翻译经常只保留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有时甚至使读者难辨原作，这种“不忠”往往遭到诟病，但这种翻译策略贴近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异域想象，让读者置身于波德莱尔所谓的“奇特的美”^②中，因而大受欢迎。《玉书》出版时俞第德学习汉语仅四年有余，丁敦龄自然而然被视为她的翻译助手。钱锺书在读到俞第德谬以千里的译文时，就想象了一位被助手蒙蔽的译者：“故译诗者而不深解异国原文，或赁目于他人，或红纱笼己眼，势必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谓：‘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勿辨所译诗之原文是佳是恶。”他对丁敦龄的批评因此更为直接：“然丁不仅冒充举人，亦且冒充诗人，俨若与杜少陵、李太白、苏东坡、李易安辈把臂入林，取己恶诗多篇，俾戈女译而虱其间。”^③抛开钱锺书的立场，这段话提醒后来者将丁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追问他的个性、学识能力乃至他与俞第德合作的动机。

对于丁敦龄的人品和文化水平，来自母国的最初评价者是外交官张德彝。他曾于1869年与丁敦龄当面对谈：

初五日丁丑，晴，凉。酉刻，志、孙两钦宪约德协理之父母姊妹，法人

^① 孟华《“不忠的美人”——略论朱迪特·戈蒂耶的汉诗“翻译”》，载《东方翻译》2012年第4期，第58页。

^② 波德莱尔著名的诗学观点“美是奇特的”对于法国现代诗学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观点萌发于诗人参观世博会的过程中，与其世界主义思想以及他对东方、南方文化的向往相关（详见波德莱尔《论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美术部分》，收入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24-332页）。戈蒂埃、俞第德都和波德莱尔秉持相似的世界主义观念和美学理念。

^③ 详见钱锺书《谈艺录》，第127页。

欧建之母与妹，暨山西人丁敦龄者，在寓晚饌，谈饮甚欢，丑时始散。闻丁敦龄品行卑污，四年前曾私某领事之幼女。领事怒，发于英伦孤岛从军。越二年某领事死，丁始回法京。后又将缝匠之妻拐去，缝匠鸣之于官，罚其坐监二年。现为欧建之记室，据外人云，恐其作幕中之宾矣。又闻新闻纸上载，丁某自称为举人，不知系某科中试？而同年者又何人也？^①

张德彝表现出对丁敦龄人品和学养的质疑，但他所记载的丁敦龄私生活信息并无文献证据。他“据外人云”而发表如此多看似确定的负面评价，反向证实了此时丁敦龄之名已在法国社会流传开来，并且伴随着争议，比如同样记载丁“掳人之妻”的出版商德雷福斯，就将丁看作不折不扣的“骗子之王”。^②张德彝的记述既包含母国人士的主观成见，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所接触的法国社会对中国移民的印象，因此早早为后来传回中国的丁敦龄形象笼上一层负面色彩。至于丁敦龄是否参与《玉书》的翻译，张德彝则未曾记载。

丁敦龄的文学功底确有令人疑惑之处。俞第德虽然几乎从未提及他是否直接介入翻译过程，却记载了他陪自己遴选诗歌等场景。俞第德可以就原诗的知识性信息请教这位“中国文人”，最终却犯了不少基础性讹误，如错将白居易《长恨歌》当作杨贵妃本人之作^③，这些讹误使评论界对丁敦龄的质疑显得有据可依。而丁敦龄主动蒙蔽俞第德、试图塑造后者的审美甚至主导翻译活动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当时他的法语能力只够应付日常沟通^④，俞第德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水平却逐年增长，而且她和不少汉学家熟识，其中就包括丁的雇主之一、著名汉学家儒莲，因此她有充分条件识别一个“伪举人”；更重要的是，俞第德个性强烈且有独立的文学观念。综合来看，钱锺书根据张德彝的记述称俞第德“赁目于他人”，可能并不确切，《玉书》仍应视为俞第德基于独立判断译就的诗集。

①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第161-162页。

② See Maurice Dreyfous, *Ce que je tiens à dire; un demi-siècle de choses vues et entendues*, Paris: P. Ollendorff, 1912, p. 101.

③ 虽然俞第德在翻译中参考了德理文的《唐诗》已是学界共识，但她选择的诗题和诗人姓名的音译却常常与《唐诗》不同，且此处白诗在《唐诗》中署名正确，因此俞第德的此处讹误不可能是参考《唐诗》所致。翻译家阿瑟·韦利曾就此评论道：“译本的主要功绩无疑应归于丁敦龄——那位与泰奥菲尔·戈蒂耶交好的中国文人；而译本中这些常有舛误却充满诗意的译文之美，则当属戈蒂耶小姐本人的才情所致。”（Arthur Waley,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19, p. 35）关于俞第德改译德理文译诗的相关问题，详见学者费尔迪南·斯多塞的研究（see 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 Judith Gautier [1845-1917]. Remarques sur l’authenticité des poèmes”, i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3 [2006], pp. 340-341, p. 348）。

④ 在重婚事件庭审中，记者发现丁敦龄表达吃力、前言不搭后语（see Fernand de Rodays, “Gazette des Tribunaux. Cour d’assises: l’affaire du Chinois Tin-Tun-Ling”, p. 2）。

《玉书》中收录了几首署名丁敦龄的“劣质”作品，它们如今在中国读者看来文采平平，当时却颇受俞第德称赞。这些诗作的来源众说纷纭。若诗作确实出自丁敦龄之手，那么评价者就要考虑除了文化功底与才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影响其创作的因素，比如对一个寄人篱下的异乡人来说，向本土归化是否也是融入所处环境的有效方式。这些诗作证明作者熟悉西方读者心理，知道如何用清晰的中国象征物打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以下试举两例：

《橙叶之影》

终日劳作于幽室的少女，忽闻玉笛之声，内心泛起涟漪；/她幻想那是某位少年的声音。/窗纸之上，橙叶之影投射在她膝头；/她又幻想着，是有人扯动她的丝裙。^①

《白发》

绿色的蚱蜢与麦苗一同生长；这美好时节，少年把酒言欢。/那些思虑深沉者却暗生愁绪，因见黑云已浮上天际。/黑燕离去，白鹤飞来；正如青丝易老，白发渐生；/世间唯此一条法则，如同天际唯有一轮月。^②

这些署名丁敦龄的诗作和《玉书》中其他名家之作的改译存在意象、情节或主旨的相似性，比如《橙叶之影》与改译自李白《采莲曲》的《在河边》都描述了少女的悸动，后者也是译诗集中紧接《橙叶之影》的诗作，《白发》则与俞第德再版《玉书》中改译自王昌龄《采莲曲》的《暖时》一样，都涉及关于年华岁月的哲思，所用核心意象也都涉及明月、白发等。因此，亦有学者根据《玉书》的篇目构成和内容风格主张托名为“丁敦龄”的诗作很大概率是俞第德自作。^③若这是事实，那么最自然的解释是，俞第德早早就认识到了丁敦龄的特殊身份和形象可以成为西方人寄托想象力的载体，在这种“故事性”的诱惑下，真假之别是次要的，关键是怎样挖掘“中国诗人”形象以推动中国风的流行。

已有学者指出，与张德彝等外交官相比，丁敦龄更容易在法国社会中成为

^① Tin-Tun-Ling, "L'ombre des feuilles d'oranger", in Judith Walter, *Le Livre de jade*, Paris: Alphonse Lemerre, 1867, pp. 7-8. 中译文为笔者自译，下同。

^② Tin-Tun-Ling, "Les cheveux blancs", in Judith Walter, *Le Livre de jade*, pp. 63-64.

^③ See Ferdinand Stocès, "Sur les sources du *Livre de Jade* de Judith Gautier (1845-1917). (Remarques sur l'authenticité des poèmes)", p. 344.

中国文化的象征：“也就是说，在法国人眼中，丁是有故事可讲的，代表着远方和异乡，或者是神秘古老的中国文化。”^① 根据俞第德的回忆，初见丁敦龄时戈蒂耶曾如此感叹：“假如我在北京，身无分文又大字不识，那我唯一的‘推荐信’就是我的外表，它会让我备受瞩目，连狗都会跟着我跑！”（*Second*: 160-161）俞第德对这段话记忆犹新，可见他们父女很可能也想利用丁敦龄的语言和身份为帕纳斯派的文学增色。1860年代的法国诗歌界掀起了中国风，其特点一是以诗意中国形象和世界主义思想对抗法国殖民文化下被丑化的中国形象，二是借“奇特的美”推动诗学发展和变革。对于戈蒂耶父女来说，唯美的中国风形象与帕纳斯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深度契合，能够体现其追求情感凝定、形式精致的静美诗学。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他们对丁敦龄大加推崇，着力渲染他的文人身份，主动塑造了这位“中国诗人”的形象（戈蒂耶甚至称其为“帕纳斯派的黄色主教”^②），客观上为丁后来的活跃创造了条件。父女二人都热情地向人介绍丁敦龄，龚古尔兄弟就曾记述戈蒂耶在晚宴上故意让“真正的中国人”^③与福楼拜、布耶同席。这个活生生的中国人对于法国文学界而言就代表着中国本身，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很快，“戈蒂耶的中国人”形象便深入人心。

由此，在法国颠沛流离的丁敦龄一跃成为戈蒂耶家中的“导师”。俞第德写道：“丁敦龄成了我的导师。当翻译的神圣决心在我心里生根，这位可怜的中国人就失去了内心全部的宁静。他再也不能在深深的扶手椅里悠闲午睡，再也不能在花园小径做白日梦，而不得不在汉语字典的214个词条中挣扎。”（*Second*: 205）俞第德一直把诗歌看作通往中国文化的钥匙，那么这位每日同她一起在巴黎街头亮相的“中国诗人”，也便可以充当西人了解中国最好的窗口。在她身边的丁敦龄被描述成受到尊重的导师、“文人”（*Second*: 163）和“非凡的人”（*Second*: 159），而在《玉书》的题词页他第一次被定义为“中国诗人”^④，随着译诗集出版，他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不久后的1868年夏天，丁敦龄主动联系《画报世界》，连载了中国题材小

① 谢静珍《丁敦龄：一个“小人物”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第83页。

② See Marc Chadourne, “Le Parnasse à l'école de la Chine”, in *Cahiers de l'AIEF*, 13 (1961), p. 16.

③ See Edmond de Goncourt and Jules de Goncourt, *Journal des Goncourt: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Volume 2: 1862-1865, Paris: G. Charpentier et Cie, 1888, p. 267.

④ See Judith Walter, *Le Livre de jade*, no pagination.

说《天子公审》。^① 这或许反映了这位“中国诗人”从被动接受塑造到主动追求自我身份的心态变化，由此他也成为当时罕见的在海外艰难留下个人“原声”的中国人，尽管受语言能力所限，他的“原声”又不得不由法国译者转述而无变形。这些连载在文类的选择和改编的策略上都能反映丁对异乡的文化环境的感知、适应和融入：作品一定程度上有讨好文化市场的倾向，包含对帕纳斯派中国风作品的模仿，比如将器物上典型的中国风男女形象与法国人关注的中国宫廷形象结合起来。^② 借助文学活动，丁敦龄渐渐以“中国诗人”形象得到巴黎人认可，还曾招收对汉语感兴趣的土耳其裔学生。^③ 除了出版商德雷福斯这种完全将其看作“骗子之王”的人，多数公众即便在丁敦龄面临信用危机的重婚案时期，都没有质疑他的学识。

丁敦龄在法国文化界的面目由模糊到清晰，这一转变过程几乎没有脱离过“衰落中国”和“文明古国”这两极形象的对弈：“掳人之妻”“骗子之王”等指责暗示着鸦片战争后腐朽堕落的 中国形象，而作为“帕纳斯派的黄色主教”的他则是“文明古国”诗意精神的化身。俞第德有意与贬华舆论进行对抗，因此她在接受丁敦龄的语言指导的同时，可能也对其身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翻译”。她一方面利用丁的“中国诗人”身份来增强《玉书》译介的说服力，另一方面则引导巴黎人通过这位文人来想象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在此意义上，丁敦龄的诗人形象也是俞第德的“文化翻译”的一部分。

^① 《天子公审》分四期连载，讲述了富家子弟李岩（音译）与貌美的陈艳英（音译）订亲，文人官进才（音译）抢婚未遂，勾结僧人万面乾（音译）将陈艳英拐走，康熙皇帝微服私访，经历艰难险阻最终惩恶扬善的故事。目前难以判定该作的具体出处，但可看出它既融合了抢亲、恶僧掠美、雪冤等中国公案小说的典型母题，也糅合了康熙微服私访等民间传说（see Tin-Tun-Ling, “La Justice du Fils du Ciel: un mariage chinois”, trans. M. Braquehait, in *Monde illustré*, 13 juin 1868, p. 379; Tin-Tun-Ling, “La Justice du Fils du Ciel: les tribulations d’un mari de l’Empire du Milieu: complication de circonstances malheureuses”, in *Monde illustré*, 20 juin 1868, pp. 391–392; Tin-Tun-Ling, “La Justice du Fils du Ciel: les tribulations d’un mari de l’Empire du Milieu: le pouvoir d’une ceinture impériale”, in *Monde illustré*, 27 juin 1868, pp. 406–410; Tin-Tun-Ling, “La Justice du Fils du Ciel: les tribulations d’un mari de l’Empire du Milieu: conclusion”, in *Monde illustré*, 4 juill. 1868, pp. 7–10）。

^② 十八世纪法国典型的 中国风形象在与洛可可艺术、异域情调工艺品并行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中西杂糅的“画屏式”特征，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报刊、插画杂志、游记和见闻录的不断丰富，约定俗成式的“典型”中国人形象逐渐流行，法国学者岱旺按出现频率梳理了这一形象序列，包括中国普通人（年轻女子、孩童、老叟、乞丐、匠人、侍从和苦力）与上层人物（清朝高官、文人、总督、巡抚、皇帝、显贵、武官等），这些形象随着商贸活动发展和政治外交事件而推陈出新（详见岱旺《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1846—2005]》，叶莎、车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 年，第 25–29 页）。丁敦龄的《天子公审》讲述了一段波折的婚姻与公案故事，涉及皇帝微服私访、伸张正义的情节，其中社会各阶层人物形象众多，覆盖了岱旺所列举的多种典型形象。

^③ See Maurice Dreyfous, *Ce que je tiens à dire; un demi-siècle de choses vues et entendues*, p. 101; Gaston Vassy, “Informations. La colonie chinoise de Paris”, p. 2.

三、失败的文化争权与湮没的学术形象

随着名气逐渐扩大，丁敦龄也开始主动参与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但这未必纯粹是为了追求利益，也有确保生存空间的客观考虑。最初踏上法国土地时，丁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名义上充当汉学家的助手、助教，实则也在加略利、儒莲家中负责洗碗、擦鞋等杂务。^① 进入戈蒂耶家之后，他与东方语言学院的日语教授罗尼熟悉起来，1863年曾为其处理一些誊抄工作并进入其课堂。^② 1869年，东方语言学院正式设立“辅导教师”（*répétiteur*）的职位，该岗位是应11月8日法国政府对学院进行重组的命令而设，要求由讲母语的“土著”（*indigène*）任职，工作内容是“提问学生，指导他们进行会话和高声朗读”^③，类似于今日的口语外教，但“土著”这一殖民用语已显示出地位的不平等性。既然母语者们已经有了“辅导教师”岗位，他们也就被隔绝在正式的教席之外。学院不给辅导教师提供终身教职，也不提供和东方学家同等的工资待遇。担任汉语辅导教师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筛选，但他们大多只工作一到两年便离开^④，因为该职位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讲席教授：在1872年官方设立预算之前，只有在任的教授愿意接受母语者出现在其课堂上，并从自己工资里拨出一部分给受聘者，“辅导教师”才能得到工作。丁敦龄的法语水平进步以后，也曾加入辅导教师的行列，希望通过汉学与汉语教育寻求自我实现，但在上述体制限制下，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档案记载非常简略：

在1869至1870学年期间，丁敦龄与李宏方、李少白一样，是东方语言学院的三位汉语助教之一。他与包括汉学家纪尧姆·鲍蒂埃在内的学者保持通信，并被德理文侯爵聘为法兰西学院的辅导教师。^⑤

① See Fernand de Rodays, “Gazette des Tribunaux. Cour d’assises: l’affaire du Chinois Tin-Tun-Ling”, p. 2; Maurice Dreyfous, *Ce que je tiens à dire; un demi-siècle de choses vues et entendues*, p. 101.

② See Angel Pino, “Trois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Ly Hong-fang, Ly Chao-pée et Ting Tun-Ling, 1869–1870”, p. 276.

③ See Marie Bossaert, “Les répétiteurs de langues orientales en Europe (xixe–xxe siècles)”, in *Encyclopédie d’histoire numérique de l’Europe*, 23 juin 2020, <https://ehne.fr/fr/node/14170> [2025–02–17]

④ 1874年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 1818–1886）接任讲席后，刘秀章（？—1879）担任辅导教师长达五年，但这种个案并不多见（see Laurent Galy, “Les «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pour la langue chinoise » [1873–1925]”, in Marie-Claire Bergère and Angel Pino, eds.,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 290）。

⑤ Qtd. in Olivier Jacquot, “L’affaire du Chinois Paul Jean Baptiste Marie Tin-Tun-Ling (Ding Dunling 丁敦龄)”.

1869年东方语言学院全面改组并设置辅导教师职位时，负责学术汉学工作的是儒莲最信任的学生德理文，丁敦龄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东方语言学院的，但他大约在1870到1871年间便已离开。此后他并没有放弃在汉学界谋求发展的机会。1873年9月索邦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他经过一系列努力依旧没有入选，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窥见他的愤愤不平：

昨天，正在索邦召开的东方学家大会犯了一个不公正的、可怕而轻率的错误。大会没有将我们的朋友、泰奥菲尔·戈蒂耶的中国人丁敦龄选为成员……他将细查所有讨论汉语的发言。说着花言巧语的东方主义者要有祸了！丁绝对要揭开他们的面具！^①

客观来说，丁敦龄在汉学界争取地位的基础还不成熟。纵然在1867年的世博会上，在巴黎城区的咖啡店和“中国风”商店里都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但当时长居巴黎的中国人数量极少，根据《费加罗报》上一些关于巴黎华人规模的报道，1872年巴黎只有五或六名中国人^②，1875年大约有七名^③，包括丁敦龄在内。在这一背景下，汉语口语的实用意义以及学术汉学的非实用性缺陷还不明显。得益于汉语人才的稀缺性，法国专业汉学家们即便未曾去过中国、不会讲汉语，但只要将实用知识隔离在汉学领域外，就能使自己的知识处在无人评价的位置上。然而，试图带着“活语言”进入汉学界的丁敦龄却危及了他们的声誉，因而在势单力薄的阶段就已成为专业汉学家的假想敌。

早在法国专业汉学创立阶段，学者们就遇到过自证难题。例如汉学家雷慕沙能用汉语书面语进行交流，采访过他的法国报刊都相信，即便在中国，中国人也因各省发音差异，常常借助书面工具来互相理解，换言之，汉语能力的核心在于书面能力。^④可是在1829年一次和中国人的会见中，雷慕沙不会口语的弱点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有报刊说：“中国人终于向满文教授雷慕沙先生展示了他们的语言……这位著名的院士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拔掉舌头。”^⑤到了1870年代，随着巴黎华人尤其是从事汉语教学的母语者的出现，专业汉学家开始面对更大的

① Le Masque de Fer, “Échos de Paris”, in *Le Figaro*, 6 sept. 1873, p. 1.

② See Punch, “Nos informations”, in *Le Figaro*, 30 déc. 1872, p. 3.

③ See Gaston Vassy, “Informations. La colonie chinoise de Paris”, p. 2.

④ See Clément Fabre, “La sinologie: la langue chinoise créée par les sinologues? Les Chinois dans le territoire sinologique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in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34. 1 (2019), pp. 97-123.

⑤ Anon., “Boutades”, in *Le Grondeur*, 13 mai 1829, p. 4.

自证压力。1910年俞第德的一段访谈不仅解释了汉学家和汉语母语者之间的尴尬关系，也反映了她多年来帮助丁敦龄被文化界和公众接受的意图。她这样解释儒莲对丁敦龄的不屑和敌意：“[儒莲]能出色地破译最晦涩的手稿，破解不可思议的方言，但日常语言对他来说仍然是禁忌。一想到这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对他说‘你好，学者先生！’，他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①俞第德的言论未必毫无情感偏向，但也吻合彼时知识界对儒莲的一致评价：他垄断学界职务并抵制一切竞争者。^②俞第德的这段话有力佐证了当时法国汉学家和中国助手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人以辅导教师身份进入汉学领域，与法国在外交、军事领域的语言需求脱不开关系。两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需要更多汉语口译员，但法国本土能培养口译员或承担口译工作的人才凤毛麟角。东方语言学院本是为培养公职机构和外交外贸领域的翻译人才而设立的，可是外交官和专业汉学家以外国人不会真心为法国服务为借口，不断延缓雇佣中国人的计划。在口译缺口过大的压力下，东方语言学院最终于1869年开始接纳中国人，但也直到几年以后才勉强认可这一工作的正式性质。在这一阶段，法国的学术汉学家和口译员-外交官式汉学家之间产生了更大裂痕，而后者和同样具有口译能力的中国母语者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③在这三个群体中，儒莲及其亲传弟子们掌握了学术汉学界的话语，法籍口译员-外交官则因提升地位的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而辅导教师们几乎不具有团结性，因为符合条件的中国人数量稀少且存在竞争关系，他们的职位并不稳定，常常是接替上任，导致自保的需求太过强烈。比如另一位辅导教师李少白就在丁敦龄重婚案时公开和他划清界限，声明自己男女关系清白。^④总而言之，多数汉语母语者处于被选择的位置，只求一时的工作，不像丁敦龄那样因在戈蒂耶家积攒的信心而表现出强烈的斗争倾向。

丁敦龄在《玉书》出版后以受过教育、精通诗律的“中国诗人”形象走红，公共声誉使他拥有了些许进行专业竞争的底气。他还曾加入共济会，或许是希望结识更多名人，能有机会改变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秩序。^⑤相应地，他对专业汉学

① Qtd. in Raoul Aubry, “Promenades et visites”, in *Le Temps*, 25 nov. 1910, p. 3.

② 关于儒莲的行事风格以及同时代人的评价，详见耿昇《学术汉学与实用汉学之争》，收入耿幼壮、杨慧林主编《世界汉学》（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37页。

③ 详见耿昇《学术汉学与实用汉学之争》，第13-37页。See also Marie-Claire Bergère and Angel Pino, eds.,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Paris: L'Asiathèque, 1995.

④ 而且与公开批评德理文的丁敦龄不同，李少白离职后也注重维持和德理文的良好关系，并在1880年代转型成为外交官-口译员（see Angel Pino, “Trois répétiteurs indigènes: Ly Hong-fang, Ly Chao-pée et Ting Tun-Ling, 1869-1870”, pp. 285-286）。

⑤ 关于十九世纪共济会的目标，详见张文木《共济会的演变及其历史命运》，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第58-59页。

家发出的质疑也迅速被媒体捕捉，甚至成为媒体表演的一部分，引发社会对专业汉学的怀疑。丁敦龄在东方语言学院和法兰西学院都担任过辅导教师，根据 1875 年《费加罗报》记载，他曾在课堂上气愤地打断德理文的教学，批评这位享有盛誉的汉学家“你不懂汉语，什么都不懂”^①。相比于这件轶事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该事件由《费加罗报》报道出来，这意味着一份阅读量巨大的法国本土报刊借丁敦龄来质疑汉学家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他们所传递的中国知识的权威性。这不是丁第一次成为媒体的工具，在 1874 年 12 月，也有媒体报道过“我们的好友丁敦龄”的不满：“丁敦龄长期担任儒莲先生的秘书。然而昨天，丁得知他那位前雇主的半身像刚刚被安置在学院里。丁立即向所有认识的人宣称儒莲先生的荣耀都应归功于他，是他帮助儒莲先生解释汉语。因此，他也想要设一座半身像。”^②

但是，就连已被公众熟悉的丁敦龄也未能真正在汉学界争得一席之地。因为专业汉学家对汉语知识的占有和对中国人的贬低，本质上从属于这一时代的殖民叙事。有研究者指出，当时西方汉学家对汉语的描述旨在取代中国人对其语言的理解，他们将欧洲的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方法加之于汉语，认为中国人还不如经过专业训练的汉学家更能洞察其母语的真谛。^③在德理文之后，口译员 - 外交官式学者在汉学界获得更大话语权，但学术汉学家和翻译 - 外交官汉学家这两个群体的领地之争完全是法国人内部的权力更迭，而丁敦龄等短暂出现在汉学界的母语者很快被逐出主流舞台。

四、昙花一现的作家与被操控的主体性

1875 年是丁敦龄离开戈蒂埃家、离开汉学界后最受瞩目的时刻。媒体对丁敦龄重婚案的报道使这次诉讼变成了一次文学事件，而案件的戏剧性也让他在身陷囹圄之际撰写的《偷小鞋》备受期待，这部小说于 1875 年 6 月 25 日出版，定价高达五法郎。法国人乐于为这本小说买单，一方面自然是由于“中国文人”狱中写书的事实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小说的装帧也极具特色。《偷小鞋》与风靡一时的《玉书》装帧方式相似，穿插着精美的书法和插图，即便是对丁敦龄充满敌意的诗人、剧作家贝热拉都承认其收藏价值：

^① See Fernand de Rodays, “Gazette des Tribunaux. Cour d’assises: l’affaire du Chinois Tin-Tun-Ling”, p. 2.

^② Gaston Vassy, “Informations”, in *Le Figaro*, 6 déc. 1874, p. 2.

^③ See Clément Fabre, “La sinologie : la langue chinoise créée par les sinologues? Les Chinois dans le territoire sinologique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pp. 97-123.

《偷小鞋》一书采用竹纸印刷，配以黄色布面封面，采用无线装订，不见丝线痕迹，阅读方式为自右向左，恰与西方书籍的翻阅方向相反。此书开本与我所提及的画册同为四开，丁敦龄的文字的译文由查尔斯·奥贝尔执笔。该作还收录了弗雷德里克·谢瓦利创作的六幅铜版画，这些画作秉承东方绘画——或更准确地说——拜占庭弥撒书那种线条明晰、构图精练、注重透视的风格。以上所述，藏书家们自然能够心领神会。^①

贝热拉肯定《偷小鞋》的装帧特色，但对小说内容却不以为然。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怀有偏见，比如他嘲讽小说所描写的礼仪风俗，称其中充满“无休止的鞠躬作揖与夸张客套的颂词”^②；另一方面，他点评小说的直接目的便是嘲笑丁敦龄在文学界受到的“恩典”：

他对泰奥菲尔·戈蒂耶的赞颂——“博大仁厚”——就像一只忠诚的狗对主人亲昵吠叫。他成了诗人家中的一员，或者不如说是诗人亲密动物园^③的一员，与猫、狗、鸟和鼠一起，生活在这艘诺亚方舟之中。我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在描述那些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的动物时，唯独漏了他。^④

贝热拉还特别指出小说的出版社由雷希尔即雨果的秘书经营^⑤，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雨果一直对中国文化和汉字具有强烈兴趣，他在晚年与俞第德交往甚密，对丁敦龄也多有照顾。

不过客观来看，《偷小鞋》的确与《玉书》中的“丁敦龄诗作”一样，让人怀疑他沉迷于“扮演”法国社会感兴趣的中国人。《偷小鞋》延续《天子公审》的改写策略，从公案小说中选择了易于吸引西方读者的文学题材，以贴合法国公众有限的中国认知和品味。但作品的这些特征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文化交往中身处弱势的一方不得已的应对策略。

① Émile Bergerat, *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 Les Années de Bohème*, Paris: Charpentier, 1911, p. 367.

② Émile Bergerat, *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 Les Années de Bohème*, p. 367.

③ 此处指涉戈蒂耶的《亲密动物园》(Théophile Gautier, *Ménagerie intime*, Paris: Alphonse Lemerre, 1869)，该作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描述了陪伴作者生活的各种动物，是反映十九世纪作家生活、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记录。

④ Émile Bergerat, *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 Les Années de Bohème*, p. 368.

⑤ See Émile Bergerat, *Souvenirs d'un enfant de Paris. Les Années de Bohème*, p. 366.

《偷小鞋》源自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的《百家公案》第二十回《伸兰纓冤捉和尚》。包公题材小说在法国的流传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1839年儒莲的学生泰奥多尔·帕维将《龙图公案》中的《石狮子》译为法语，1864至1873年罗尼陆续发表了《阿弥陀佛讲和》《观音菩萨托梦》。^①丁敦龄的小说发表于包公形象在法国流传有限、相关作品译介缓慢的背景下，他因此也有比较自由的改编空间。原作中，永宁寺和尚吴员城见施主张德化之妻韩兰纓年轻貌美，心生邪念，于是贿赂婢女小梅，窃得兰纓睡鞋一只，将睡鞋丢在寺门前让张德化拾获，后者怀疑妻子清白，将其遣回娘家。吴员城遂蓄发还俗，化名冯仁，托媒人前往兰纓家中求亲。兰纓之父不知内情，应允婚事。冯仁酒醉得意之际向兰纓吐露真相，兰纓羞愤之下自缢身亡。包公巡至江州，兰纓之父与兰纓鬼魂现身诉冤，包公查明真相后将冯仁判处死刑，兰纓沉冤得雪。^②原作内容简洁，通过功能化的人物传达出恶有恶报的天道思想；而丁敦龄的《偷小鞋》将故事扩展到五十多页的篇幅，增加了心理描写以传达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③尤其是婢女小梅的人物弧光更加完整，她起初因贪婪和无知而偷出鞋子，看到自己酿成的后果后愧疚不安，再见吴员城时产生了为主人复仇的勇气，被吴员城强奸和囚禁时又充满恐惧，最终通过忏悔与自杀来揭露真相。小说中的官员是在小梅牺牲自己、真相大白后才介入的，可见故事的核心主题由清官断案与天道报应被改写成情感和救赎。

比较原作和丁敦龄的改写可见，《偷小鞋》在人物心理描写、对中国习俗的刻画等方面确实存在对西方审美的迎合。但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偷小鞋》和《天子公审》都具有文学史价值，它们不仅成为明清公案小说西传的案例，也体现了丁敦龄的文化转译能力。这种文化转译背后是丁敦龄的自我规训与深刻无奈，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群体性的文化心理。他在小说开篇自述道：

我深陷囹圄而写成此书。

我虽是山西一介寒儒，诸君读此书来或觉有趣。

① 详见陈茜《公案小说在欧美的译介——以〈龙图公案〉为中心》，载《中国翻译》2024年第3期，第62-70页；李牧雪《包公形象在法兰西语境的译介与传播》，载《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3年第1期，第39-57页。

② 详见安遇时编集《百家公案》，石雷校点，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58-60页。

③ 小说对兰纓、小梅两个人物都展开了具体的神态、外貌、情感和语言描写；比如兰纓遭到冤屈时“如从噩梦中惊醒，嘴唇微张却吐不出半个字，只觉得胸口气闷，惊恐地望着丈夫起伏的胸膛”（第三章）；听闻父母将她另配他人的安排时，她自称“早于庄严佛像前立誓，此生唯张相公而已”，“但面对二老的辛酸泪水，无奈应允”（第五章）；又如小梅得知铸成大错之际“冷汗浸透四肢，头重得像灌了铅”，“瘫在地上，愈发消沉，手掩着面”（第三章）（see Tin-Tun-Ling, “Au public français”, in *La petite pantoufle [Thou-sio-sié]*, trans. M. Charles Aubert, Paris: Librairie de L'Eau-Forte, 1875, no pagination）。

离开中原十四载，我已近乎遗忘过去光阴。我踏上诸君先祖的土地，觉西洋人皆宽厚良善。

三生有幸，得遇泰奥菲尔·戈蒂耶！其胸怀博大仁厚，为我敞开门。他于我宛若天人降世，慈光普照。今他已与世长辞：愿其遗体得享安宁。

1872年——彼时我神智昏聩——我缔结婚姻，因此之故，竟被剥夺自由两月有余。然我心中无怨无怒，囹圄之中写成此书，欲为诸君展现我那远如星辰的故国风习。

同一轮烈日照耀我们，同一片天空庇护我们，愿诸位待我如共居檐下、同沐光辉的兄弟。

孔夫子有言：“Pou-Toun-Kiao-Toun-Li”^①。人心也相通。

恳请诸君倾听吾言。

丁敦龄

山西人^②

丁敦龄在此着重介绍了自己的中国文人身份、流亡经历、与戈蒂耶的相遇以及狱中写作的特殊背景。他有意强化自身温润自持的君子形象，展现自己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文化传播动力的胸怀，期待西方读者借此作品了解中国习俗，并强调人类共通的理性和情感，流露出对某种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期待。丁敦龄在小说里用冗长的脚注阐释中国女子睡鞋所承载的贞洁观念^③，对小梅和兰瓔的丰富内心进行细致描绘，这些细节的确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以及传播中国文化的抱负，而其具有表演性的序言也让一位漂泊海外、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轮廓更加清晰。

^① 《论语》等中国典籍中无法找到对应的汉语原文。从发音来推测，这句汉语可能是“不同教，同理”，即宗教不同，其理相同之意。

^② Tin-Tun-Ling, “Au public français”, in Tin-Tun-Ling, *La petite pantoufle [Thou-sio-siè]*. 关于丁敦龄的史料常常强调其中式法语的生硬和夸张感，此处的译文也尽量靠近这种语言风格。

^③ 丁敦龄在第一章结尾添加了两段注释：“中国女子只在夜间或者白日歇息时穿睡鞋，但绝不会穿着睡鞋走出内室。在中国，将睡鞋示于外人是一种失礼之举，严重程度堪比法国女子让人看见只穿衬衣的荒唐行径。此外，女子不穿底袜，只用黑色宽绸带缠足，通过折磨双足获得一种贵族风范。这种酷刑从八岁便开始。出门时，她们会穿上精致的绣花鞋，但她们极少行走且步行极为艰难。在自家花园散步时，她们步履笨拙，只能以小碎步轻轻跳动，宛若被剪去翅膀的鸟儿。这般奇特步态竟是良家女子教养的首要条件，违背风俗甚至可作为休妻的理由。中国男子几乎全部恪守旧俗，即便在新婚夜也会毫不犹豫地以女子违背此风俗为由而要求离异。爱情是钟爱危险的，将鞋——尤其是睡鞋——奉为最珍贵的定情信物，就是因为它最能引人非议。私密赠物的选择还暗含微妙差别：绣花鞋向情郎传达的是坚贞不渝的柔情、无边无际的爱意，虽仍存最后一道鸿沟需跨越，却已等同于最甜蜜的诺言。而当情郎将又香又小巧的睡鞋藏于胸口时，便意味着他想要的已经尽在掌握了。不言而喻，睡鞋愈是破旧，便愈发珍贵。”“因此，中国男子亲自焚毁妻女不能再穿的旧鞋方得安心。纵是渴求猎奇的旅行者，也休想在中华大地觅得一双遗弃的睡鞋——除非他得到放荡女子以爱为名的馈赠。”（Tin-Tun-Ling, *La petite pantoufle [Thou-sio-siè]*）

丁敦龄对戈蒂耶的感激或许是序言中最为恳切的部分。戈蒂耶父女是当时法国文化界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作家，他们接纳穷困的丁敦龄，用文学呼唤世界主义，书写诗意中国而非堕落中国，但这个中国依旧不可避免地是一个被过度想象的“中国”，而作为其活的象征的丁敦龄也被寄托了法国文人的想象，既真实又虚幻。丁敦龄本人无力反抗法国的文学界、媒体行业甚至整个巴黎社会对他的好奇观看与塑造，并且也逐渐顺应乃至享受这种位置，他通过各种方式主动活跃在巴黎的文化舞台上，但他的主动性实则是虚假的，是被社会喜好所操控的。

《偷小鞋》是丁敦龄市场反馈最热烈的一部小说，他的名气在此刻达到鼎盛，但之后的其他创作都以惨败收场。比如他试图通过《胡国女将》《长江泛滥》^①等戏剧作品巩固文化身份，却遭到冷遇和排斥。《新闻报》如是说：“您想必知道丁敦龄，那位戈蒂耶的中国人，也就是在讷伊带来这出怪戏[指《胡国女将》]的文人吧？他的失败让巴黎感到恶心，干脆让他擦擦鞋上的尘土滚回祖国。他月底就走，上帝！”^②在一连串的失败后，丁敦龄人生的最后阶段和初到巴黎时无异：“无人知道他何以为生。他把精美的丝绸长袍脱下，换成自己手裁的棉布印花长衫，他把阳伞也换回了棉布制伞，把漂亮的凉鞋换成系带长靴，他吃得不多，几把米便够了。三不五时，俞第德给他送去补给。”^③直到1886年的葬礼，他才最后一次吸引了巴黎公众的目光。相关报道暗含优越感的冷静语气说明^④，丁敦龄给法国社会带来的新奇感已然耗尽，他的文学才能也不足以让大众消除文化偏见。这个中国人身上被贴上了滑稽的投机者的标签，这深刻影响了其流传于后世的形象。

在1870年代身处巴黎的少数中国人当中，只有丁敦龄的一举一动能进入公众视线并持续被媒体跟进，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文人形象与帕纳斯派的中国风审美的契合，但这种审美取向不足以跨越圈层扩展至汉学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小人物映照着大世界，媒体上对丁敦龄的各种批评没有脱离当时法国社会对

^① 《胡国女将》于1874年7月在罗西尼剧院上演（see Bixiou, “Matinée chinoise”, in *Le Gaulois*, 7 juill. 1874, p. 1），《长江泛滥》于1875年7月在罗西尼剧院上演。丁敦龄这两个剧本均未出版，罗仕龙据巴黎歌剧院图书馆藏《胡国女将》手抄本，指出该作讲述印度支那总督因敌国入侵而无奈应允其子与敌国女王婚姻的故事。《长江泛滥》手抄本不存，故难以确定其具体内容。据罗仕龙研究，这部戏属于法国图卢兹洪灾后慈善演出的一部分（详见罗仕龙《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戏剧舞台上的中国艺人》，载《戏剧研究》2012年第2期，第21页）。

^② Anon., “Gazette du jour”, in *La Presse*, 10 juill. 1874, p. 3.

^③ Grison, “Tin-Tun-Ling”, in *Le Figaro*, 29 déc. 1917, p. 3.

^④ 《自由进歩报》的报道以调侃与怜悯相交织的笔调总结了丁敦龄的人生（see Anon., “Un Pékin de Paris”, in *Le Progrès libéral*, 22 nov. 1886, p. 2）。

中国人的定见，如懦弱、贪图利益和善于欺骗。^① 这些批评者以俯视姿态将丁敦龄评价为“首都的珍玩之一，甚至装饰品之一”^②。

戈蒂耶父女虽然积极为丁敦龄塑造中国诗人的形象，但帕纳斯派诗学本身具有罗列静物、去意义化的特征，这导致他们在介绍丁敦龄时也习惯性地将其物化，使其成为静美诗学的形象载体。法国社会的态度与丁敦龄本人看似主动的文化行动共同将其推向客体位置：无论是每日出现在皇家图书馆门前的“戈蒂耶的中国人”、还是揭开汉学家“面具”的汉语母语者，抑或是在重婚案中写出小说的中国作家，丁敦龄始终都是被观看的“珍玩”。

尽管如此，在回顾中法文化交流史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丁敦龄在不平等的文化语境中做出的事实贡献：作为俞第德的家庭教师，他至少间接促成了《玉书》乃至一系列相关译诗集在欧洲的问世和传播；作为汉学家助手和辅导教师，他为法国的汉语教学以及汉学的发展尽了一份力；作为写作者，他推动了中国公案小说在欧洲的传播。更重要的是，丁敦龄的形象折射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对中国模糊而充满矛盾的认知，也有助于引起今日读者更具深度的思考：在文化交往中应如何展示更加真实的中国，创造汇通东西的“中国风”？

[作者简介] 王洪羽嘉，女，1995年生，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比较文学等。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异常〉中的科技伦理与〈齐物论〉思想》（载《当代外国文学》2025年第2期）等。

责任编辑：高华鑫

^① See Lo Shih-Lung, *La Chine sur la scèn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5, pp. 67-117; 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27、332-333页。

^② Un Geai, “Tin-Tun-Ling”, p. 2.